

中国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之二)

古书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 线装的起源与流变

【中国】李致忠

【英国】吴芳思

中国书史中,有待发掘、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很多,而书籍各种装帧形式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则是其中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文献》第二期上,我曾对中国古书中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进行过考辨,那是为了消除误解,辨明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一九八六年九月,有机会赴英国做短期讲学和考察。其间承蒙大英图书馆东方部吴芳思博士的热情关照,得窥一些原出自中国敦煌石窟,而今珍藏在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敦煌遗书。经与吴芳思博士共同谛审和研究,觉得其于中国古书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起源与流变,颇有考据和研究价值。故结合这些藏品,谈谈我们对上述装帧形式形成与演变看法。

一、梵夹装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书中固有的装帧形式。它起源于印度,或者说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书写在多罗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式的一种称呼。此可由下列文献得到充分的证实。

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书写在多罗树叶上的,汉译多罗树叶叫“贝多罗”,故又称为贝叶经。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恭建那补罗国(属印度境)条记载,说:“(那补罗国)城北不远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

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

《大唐西域记》尚书左仆射燕国公序,称赞玄奘说:“于是词发雌黄,飞英天竺,文传贝叶”。

《酉阳杂俎》卷十八称:“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一者多罗婆(一曰婆)力叉贝多;二者多梨婆(一曰婆)力叉贝多;三者部婆(一曰婆)力叉多罗梨(一曰多梨贝多)。并书其叶,部阖一色,取其皮书之。贝多是梵语,汉翻为叶;贝多婆(一曰婆)力叉者,汉言树叶也。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若能保护,亦得五、六百年”。

《旧唐书·南蛮传》称:“堕婆登国在林邑南……。其国种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书之于贝多叶”。

《新唐书·西域传》称:“中天竺……有文字,善步历,学《悉曇章》,妄曰梵天法。书贝多叶以记事”。

所有这些记载,可以充分证明,古印度,甚至包括地处热带的南亚,都有利用多罗树叶做为书写载体的习惯。印度的古梵文佛教经典就更是普遍采用这种树叶书写了。

书籍的装帧形式,取决于书籍的制作方法和制作材料。古印度的佛教经典既然书写在多罗树叶上,其装帧形制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这就出现了所谓“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诠释,那就应该是:写在多罗树叶上的梵文佛教经典所采用的一种夹板式的装

帧。其具体的装帧方法，是将书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自然次序，顺序排好，形成一撁。再在贝叶的一定位置上逐叶穿凿园孔，然后上下各用一块竹板或木板，将撁好的贝叶经夹住。而竹板或木板的相应位置也要穿凿园孔，以便与贝叶经上的园孔对直相通。最后用麻绳或丝线绳，先将一头打成比园孔稍大的绳结，以免穿连夹板和贝叶经时从这头脱扭。再用绳的另一端从卷尾向前逐叶相穿，直至穿过上夹板，尚有相当长的余绳。这段余绳有两种作用，一是诵念经文时可逐叶翻过，不致于脱绳，二是收藏时以余绳缠绕夹板和整个贝叶经。

何以见得是如此的装帧方法呢？一是迄今尚有贝叶经传世，能以实物的资格证明这一点。二是有文献可稽。《资治通鑑》卷二十五唐纪唐懿宗咸通三年（862），说唐懿宗“奉佛太过，怠于政事。尝于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僧尼受戒，两街僧尼皆入顶。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元朝胡三省给这段文字作注时，于“梵夹”二字之下称：“梵夹者，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胡三省这两句话表达了两重意思，一是以贝叶经来训释梵夹，即梵夹指的就是贝叶经，或是装帧起来的贝叶经就是梵夹。二是进一步解释了贝叶经为什么又称为梵夹，其原因是“以板夹之”，故“谓之梵夹”。这是元朝人对梵夹及梵夹装帧特点的解释。

近人丁福保编有《佛学大辞典》，其于梵夹条称：“梵夹，杂名。又曰经夹。又云梵篋。多罗叶之经卷也”。于梵篋条又称：“梵篋，杂名，多罗叶之经卷。贝叶重叠，以木板夹其两端，以绳结之。其状恰如入于箱，故云梵篋”。这是近人丁福保对梵夹及梵夹装帧特点的解释。

这种装帧，古印度人是否也称为梵夹，不得而知。古代中国人对印度梵文书写之贝叶经的装帧呼为梵夹，倒是不乏文献之征的。

隋朝杜宝在其《大业杂记》中，对梵夹装的来历有过一段形象生动的描绘。他说东都（今洛阳）“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足见隋朝（581—618）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梵文佛教经典两板相夹形式的装帧，形象地称为梵夹。

《续高僧传》卷一称：“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初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二百四十夹”。

《续高僧传》卷二称：“大业二年（606），东都新治……。敕于洛阳上林园立翻经馆以处之。供给事隆，倍逾关辅。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称唐玄奘从印度所取回的佛经为“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一十四部；大众部经律论一十五部……，凡五百二十夹，总六百五十七部”。

《宋高僧传》赞宁序称：“浮图揭汉，梵夹翻华”。

《宋高僧传》卷一称：“释不空……至天宝五载（746）还京，进狮国王尸罗迷伽表及金宝璎珞、般若梵夹……等”。

《宋高僧传》卷三称：“释满月者，西域人也。……开成（836—840）中进梵夹”。

《宋高僧传》卷三又称：“翻梵夹须用此方文籍者，莫招滥涉儒雅之过乎”。

《宋高僧传》卷三还称：“莲华精进，本屈支城也，即龟兹，亦曰丘兹，正曰屈支。时唐使车奉朝到彼土城西门外，有莲华寺，进居其中，号三藏菴。奉朝至诚，祈请开译梵夹，传归东夏。进允之，遂译出《十力经》”。

《宋史·外国传·印度》称：“乾德三年（965），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还，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

又称：“开宝（969—976）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

又称：“至道二年（996）八月，有天竺僧随船舶至海岸，持帝钟、铃杵、铜铃各一，佛像一躯，贝叶梵书一夹，与之语，不晓”。

所有上述这些文献资料，可以充分证明，古代中国人关于梵夹的称谓，是专指从印度传进来的、未经翻译的、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而又用两板相捆夹的梵文佛教经夹而言的。它的得名从外观装帧形式而来，后来逐渐演变为贝叶经或印度佛经的代名词。因此，梵夹装当起源于印度，得名于中国。它和“浮图揭汉，梵夹翻华”之后的汉文佛经，先采取卷轴装，后又改造为经折装，在装帧上没有必然联系。不能把经折装就称为就是梵夹装。梵夹装与经折装非但装帧形式不同，其制作材料、书写文字等也不同。多年来误把梵夹装与经折装等同起来，或两者互训，应该予以澄清。

上面花费那么多笔墨，目的在于要说清梵夹装的起源。源头清楚了，流变便可沿岸寻觅了。

前边我们之所以敢于提出把梵夹装与经折装等同起来的观点是糊涂观点，其科学根据在于我们见到了中国古书中有模拟梵夹装的实物，而这种实物绝非经折装。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珍藏几件出自中国敦煌石窟的遗书。这几件遗书的装帧，当是起源于印度的梵夹装式在中国的流变。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 S5532 号，是《禅门经》，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共十九叶，三十八面。每面书字六行，每行字数不等。有边栏界行。每叶为长条状。每叶第三行的界行线上，距上边栏三分之一距离处、距下边栏三分之一距离处，各有一圆孔。这两个圆孔是干什么的？无疑是某种装

帧的遗迹。是什么装帧的遗迹？从印度贝叶经的装式，即梵夹装的特点来考察，这种遗迹显然是中国纸写佛经模仿梵夹装的遗迹。可惜穿绳及上下夹板早已散佚，无复见其完貌。但从其叶取长条，条中有孔的情况看，显然是模拟贝叶经和贝叶经的梵夹装式。此为古书也有梵夹装的实物证明之一。从纸墨字体等特点看，此件很可能是唐代晚期写本，至晚也是五代写本。可证唐五代时期中国书籍是有梵夹装的。而这种模拟的梵夹装，与之同期出现并逐渐流行的经折装是完全不相同的。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 S5533 号，是《佛经疏释》，亦是麻纸书写，双面书字。每面六行，每行字数不等。经叶为长条纸，似仿贝多罗树叶。无上下边栏，却有界行。然界行并非笔绘，而似原纸隐纹，又似划压出来的纹路。这从造纸上有很特殊的研究价值。每叶第三行的行线上，距上边三分之一距离的位置上，亦都有一圆孔，且圆孔边缘有绳磨的痕迹，显然这也是中国纸写佛经模拟梵夹装的遗迹。惜其穿绳及夹板早已散佚，不可复见其完整装帧的原貌。但它仍不愧是中国古书也有梵夹装的实物证据之一。这件遗书亦不会晚于五代。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 S5537 号，是《唯识三十论要释》。麻纸书写，双面书字。书叶为长条纸，显系模仿贝多罗树叶。有边栏界行。每面八行，每行字数不等。特点是单叶两面书字，凡五十六叶，一百一十二面。首叶残佚，故开面便是文字。但尾叶只单面书字，无字的一面便做了封底。由此推知，首叶亦当是单面书字，无字的一面即当是封面。现在已是散叶，然每叶第四行行线上距上边三分之一距离的位置上，亦都有一圆孔，圆孔边缘亦有绳磨痕迹，足见此件亦是中国古书模拟梵夹装的实物证据之一。从纸墨字体的特点看，此件的抄写时代亦当是唐末、五代。

现存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这三件敦煌遗书，表明唐五代时期，在经折装出现并流行的同时，也有模拟贝叶经的梵夹装出现。后世虽无这种梵夹装继续发展，但这种梵夹装的变态性装帧却是赓续不断的。如后世印本的蒙文经、藏文经，明清两代宫里泥金书写的佛经等，不少是单叶双面印、写，而后集数叶为一叠，用两块较厚、乃至雕漆彩绘的木板上下相夹，再用扁型布带捆扎。这样的装帧也可以称为梵夹装，不过，这是变了态的梵夹装。

透过上面的分析，关于梵夹装的源、流、变的脉络是很清楚的了。它起源于古印度，模拟流行于中国唐五代，演变于明、清之世。这也是一条渊源有自的书籍装帧形式演变史的长河。沿着这条长河，无论是溯流而上，去寻找它的源头；还是顺流而下，去探讨它流变的踪迹，都是非常有趣味的。

二、旋风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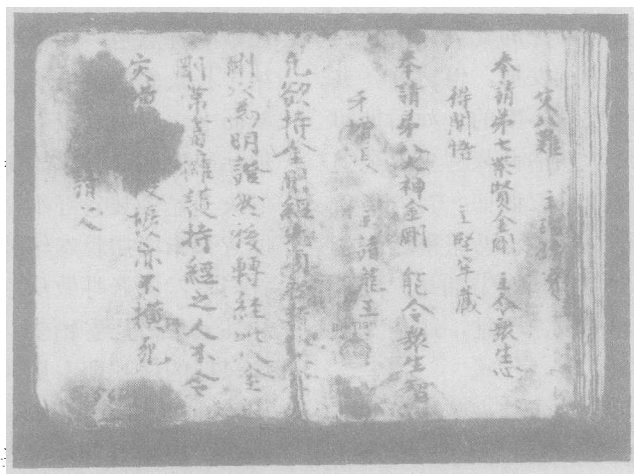
旋风装是在卷轴装盛行的唐代，为解决书籍的翻检方便，对卷轴装实行改进而形成的一种装帧形式。这种装帧形式的具体做法是：以一长条卷子纸做底纸，然后将单叶单面书字的书之首叶，全幅粘裱在底纸的右端。接着将单叶双面书字的其它书叶，按着内容和页码次第，首先将第二叶的右边无字空白窄条处粘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粘好后的第二叶从左向右翻开，晾出底纸，再以第三叶右边无字之空白条处粘于第二叶右边粘缝左下的底纸上。粘好后再将第三第二叶同时向右翻开，继续晾出底纸，再用同样的方法将第四叶粘在第三叶右边粘缝左下的底纸上。此下第五、第六……叶，均照此例，依次粘连，直至最后一叶粘完。这样粘的结果，就形成了书叶逐叶朝左相错，第二叶在左边表现为最短，第三、第四……叶在左边逐叶向左伸长，因而形成最末叶最长。看右边，因为上叶压下叶，看不出向左相错的情状。但

看左边，因为每个下叶都比自己的上叶向左长出一条，故形成了鳞次相错的情状。这种装帧的特点是：除首叶因单面书字、全幅粘裱于长条卷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各叶双面书字，均只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相错地粘于卷底纸上，故每叶都能翻动。这样就解决了卷轴装卷舒不便，检阅极难的弊端。但它又未能摆脱卷轴装的外壳，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叫做从右向左卷起、捆紧，故从外表看仍是卷轴装。但里边的书叶却是像旋风似的逐叶朝右旋转，故后人将它称之为旋风叶、旋风叶卷子，我们就把它称之为旋风装。但也有人注意其打开时左边书口处形成的鳞次栉比的特点，认为其状似龙鳞，故又称之为龙鳞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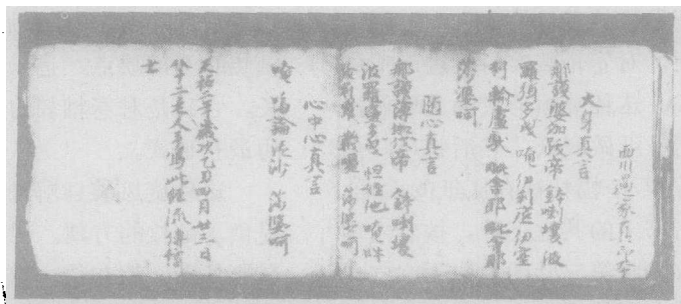
“龙鳞装”也好，“旋风装”也好，这只是个名称而已，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种装帧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变时期的一种过渡形式，它既具有册叶装帧的特点，又未摆脱卷轴装的制约。既不是完全彻底的册叶装，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卷轴装。既未完全扬弃卷轴装的全部缺点，也未全部具备册叶装的优长。它只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册叶装的最初形式。

这种旋风装只解决了卷轴装卷舒困难，提供了翻检的方便。但由于仍然保留着卷轴装的外壳，故存放、携带、翻检仍然不便。需要进一步改进，彻底摆脱卷轴装的桎梏，才能彻底过渡到册叶装。在这方面，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所藏的敦煌遗书中，又提供了实物证据。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444号，是唐末写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图一）。为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开本比现在的三十二开略小，但为横用竖写。无边栏界行。卷尾有“西川过家真印本”一行，说明此经之传抄，系出于西川过家雕印的《金刚经》。而后是大身、随心、心中心三真言。最后是天祐二年岁次乙丑四月廿三日八十二老人



唐天祐二年（905）写本《金刚经》龙鳞装式（旋风装）



唐天祐二年（905）写本《金刚经》卷尾

手写此经流传信士”落款一行。表明此经之传抄是在天祐二年。按天祐，是唐哀帝李柣的年号，二年正是乙丑，即公元九〇五年。再过二年，唐王朝就覆灭了。这件东西的装帧颇具特色，足资考镜。

其具体装法是：先予备好封底，或者称下封面。而后依次排好所写的经叶，从最末叶开始，先以右边无字之空白条处粘于封底

的右边上。而后再以次末叶之右边无字空白条处向左相错地缩粘于末叶右边之空条处。依此类推，此后每叶均以右边无字空条处向左相错地粘于先此粘好书叶的右边无字空条处，直至粘完第一叶，最后粘贴上封面。天祐二年八十二老人手写的这卷《金刚经》，上封面已经佚去，但从仍存底封面看，当年必定粘有上封面。这种装帧从书的正面

看，书脊处不齐，而是逐叶向左相错，形成了逐叶向右延伸的龙鳞状，或者说是鳞次栉比状。而从正面看书口，由于上封面向左相错最长，掩盖了书口情状，故看不清其具体形象。但如果将书调个正，看书的背面，则书口逐叶向左相错，形成了鳞次栉比的龙鳞状，与我们前边所描绘的旋风装大同小异。

这种装帧叫什么名字，不得而知。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它是对旋风装的改进，二它已是接近册叶装了。

我们前边说过了，旋风装克服了卷轴装卷舒之难、查检不便的缺点，但毕竟还完全没有摆脱卷轴装的桎梏。为了彻底摆脱卷轴装的制约，使旋风装进一步朝册叶装过渡，于是由这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八十二岁高龄的老翁动手改造旋风装。使旋风装固有的长条卷子底纸大幅度缩短，短到与书叶大小相同，变成册叶装的封底，或者称为底封面、下封面。同时大大缩小开本，使原来较大的旋风叶，变成较小的书册叶。于是原来卷起来的旋风装，变成了不用卷舒而更易翻检的装帧。这种装帧虽然不敢说它就是标准的册叶装，但除了书脊、书口尚呈相错的鳞次状外，其余与册叶装已无甚区别了。

北宋欧阳修在其《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郢《彩造》之类是也。”欧阳修是北宋初期的名人，唐五代时的遗书大概还目睹不少。他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基本符合史实。“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过去不甚理解。怎么叶子又似策子呢？原来他说的叶子，是装帧起来的叶子，不是一张一张的散叶。为什么要以叶子写之？因为要便于翻检，卷轴难数卷舒。这些叶子怎么装帧呢？就要像吴彩鸾所写的《唐韵》、李郢《彩造》那样。李郢《彩造》如何装帧，已

无法目睹。但所谓吴彩鸾所书《唐韵》，实际即是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却至今流传于世，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它的装帧就是我们前边描绘的旋风装。或者说，我们前边关于旋风装的描绘，便是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而来。欧阳修把这种装帧的叶子，说成是其制似今策子。他所说的“今策子”到底什么样，不好揣度。今有大英图书馆所藏此件，“其制似今策子”的概念，便觉着可以琢磨了。唐末五代，乃至北宋初年，流行的“策子”大概可能即类乎此。因此，这件东西的出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旋风装源于卷轴装，流于龙鳞装，变为册叶装。这又是一种装帧的起源与流变。

三、蝴蝶装

蝴蝶装是宋代雕板印书盛行以后形成的一种装帧形式。它风靡于宋元两代，流行大约四百年。《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这里所谓“装用倒折，四周外向”的装帧，说的就是蝴蝶装。而且都是“宋元所遗”，可见宋、元时期蝴蝶装确曾风行一时。

但是否蝴蝶装起源也在宋代雕板印书盛行以后呢？我们认为“形成”与“起源”并不是一个概念。“起源”与“形成”所需要的条件、规格、定型等方面的标准，均不相同。据大英图书馆所藏中国敦煌遗书中的实物看，蝴蝶装的起源与流变，也应重新加以研究。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450、S5451号，都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装订方式也完全相同。亦均为粗厚麻纸书写，开本大小也相同。唯S5450一部无年款，不知是何人抄自何年。但从S5451一部看，S5450亦可大体推知。

S5451《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唐末写

本。开本较现代三十二开本略小，较六十四开又略宽。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无边栏界行。每半面六、七行不等，每行字数亦不等。共十六叶，存二十九面文字。第一叶背面右半叶不书字，对折装订之后就做上封面。今上封面已佚，故文字也佚去一面。最后一叶背面左半叶不书字，对折装订后即做封底，今仍完整无损。卷尾题名《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尾题名之下，有“西川过家真印本”一行。表明此经之传抄，是以西川过家的雕印本为底本的。而后是大身、随心、心中心三真言。“心中心真言”右下方有“最不可思议”几字。最后落款为“天祐三年丙寅二月二日八十三老人手自剞血写之”，表明此经于唐天祐三年（906）二月二日，由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手写而成。再过一年，李唐王朝就覆灭了。

这件东西，与S5450一样，在装帧上别具特点。除首叶背面右半叶、末叶背面左半叶未书字外，其余各叶由于都是双面书字，故对折之后就形成了四面是字。各叶对折之后，以折边为准依次排好戳齐，然后将折边各叶彼此粘连在一起，形成书脊，这本佛经就算装订完了。

这种装帧和后来蝴蝶装的折叶、粘连方法基本相同，当是后世蝴蝶装的尝试和起源。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448号，是《敦煌录》。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凡七叶十四面。前为“唐故河西归义军节度押衙兼右二将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检校二字写颠倒成校检）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浑牟邈真赞并序”共五叶。后有带边栏界行的空叶六面。前后各有封皮。但前后封皮均非另加，而是首叶背面右半叶不书字，为空白，对折之后便充当上封面。末叶背面左半叶不书字，为空白，对折之后便充当底封面，其余书叶对折之后，全形成四面有字。这件东西的抄写时代，大概不会晚于唐末五代。其装

帧办法与S5450、S5451两件全同。足见这种装帧在唐末五代已非属罕见。这就给进入北宋之后，随着雕板印书的兴盛而形成蝴蝶装，奠定了基础。

北宋雕板印书盛行之后，为适应一版一叶的特点，且为单面印刷，便逐渐形成以有字的一面为准，字对字地对折，而后将折叶排好顺序，戳齐折边，使折边逐叶彼此粘连，形成书脊。再用一张整纸对折，粘裹书脊，并做前后封皮。这种装帧由于版心集于书脊，仿佛蝴蝶的身躯，打开来，好似蝴蝶展翅飞翔；收藏时，又好像蝴蝶合并双翼落于花草丛中，故称为蝴蝶装。当我们知道唐末五代就有了类似的装帧时，便觉得蝴蝶装早在唐末就已出现；而当着北宋雕板印书盛行以后，由于是一版一叶的特点，就更适合采用蝴蝶装，故蝴蝶装便流行了起来。待到蝴蝶装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便逐渐为包背装所代替，这已是流行之后的改变了。这又是一种装帧的起源与流变。

四、包背装

包背装是以包裹书背为特点的装帧，也称为裹背装。过去通常说法，一般都认为这种装帧起自南宋，流行于明、清两代，特别是这两代的内府书或其他官书，通常都采用包背装。此由迄今仍存于世的大量实物，如明内府写本的《永乐大典》、清内府写本的《四库全书》等可以证明。我们根据现存的大量包背装书籍，包括南宋刻本并带有包背臣衙名的《文苑英华》，审其装帧原理，则类似这种装帧的书籍，在北宋初年就出现了。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589号，是《大悲心真言》卷下。此件为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宽窄与现代三十二开本书差不多，但高却只有三十二开书的三分之二，近于小方册。共二十六叶，五十二面。有边栏界行。每半面六、七行不等，每行字数亦不等。折叶方式是以中间为准，对折。折好

的书叶依次排定，截齐折边，用线装订。其装订方式，从内部看，类乎骑马装订式；从书脊看则是五针横索，类乎现代平、精装书的索线方法。线为杏黄色丝线。另外用一张比书册稍宽的整纸对折，粘包于书背之上，做为书衣，或者叫做上下或前后封皮。这种装帧在固定书叶、包裹书背等原理上，与后世的包背装大同小异，堪称包背装的起源。这件东西的卷尾，有“开宋皇帝□制禧”题记一行，表明此经之书写，当在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之世。按赵匡胤以后周殿前点检和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身份，于陈桥发动兵变，黄袍加身，是在公元九六〇年。而他辞世由其弟继承皇位是在公元九七六年。此件题记既称“开宋皇帝”，则其抄写年代自当在公元九六〇—九七六这十六年之间。足见北宋初年就已有了包背装性质的书籍出现。

待到宋代雕板印书大兴之后，较长时期内盛行蝴蝶装。而就在蝴蝶盛行的同时，其装帧弱点也就暴露了出来。到南宋中后期，针对蝴蝶装的弱点，出现了包背装。包背装的折叶方式，与蝴蝶装刚好相反。是将印好的书叶正折，版心朝左向外，文字向人。书叶左右两边的余幅，由于正折，便齐向右边书脊。折好顺好的书叶，以书口版心为准截齐。在右余幅上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以固定书叶。而后将书脊裁齐，再用一张较书叶略大的硬厚整纸对折，粘于书脊，把书背全部包裹起来，剪齐上下及两边的余边，一册包背装的书就算装帧完毕。

以这种包背装与我们前边讲的那本《大悲心真言》相比，虽然在折叶和固定书叶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在包裹书背这一点上则是完全一样的。这是雕板印书所决定的，是适应雕板印书的单面印刷、合页装订的特点，经过改进而形成的装帧方式。待到社会继续发展，社会人们对书翻阅的频率继续加大时，包背装容易散裂的弱点又暴露了。于是一种新的装帧——线装书又应运而生了。这又是

一种装帧形式的起源与流变。

五、线装

线装书之得名来自用线缝缀装订书册。过去一般的说法，认为这种装帧起自明朝中叶以后。其背景是针对包背装经不起经常翻阅而采取的改进措施。这种说法，通常也可以认为是对的。但从用线缝缀、装订书册的特点出发，说是线装书起自明朝中叶以后，那就不大符合历史事实了。

南宋初年有个叫张邦基的，他写了一本笔记性的著作，名《墨庄漫录》。他在这部书的卷四中说：“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缀，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缀之弊也’。”这段话是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借用王洙的话来品评书册装帧采用缝缀与粘连优劣的。王洙字原叔，应天宋城人，是北宋嘉祐以前的人物。进士出身，官终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曾于北宋仁宗时，参加过撰集《集韵》的工作。他生活的时代，离宋代开国仅半个世纪左右。他以切身的经验体会，道出了用线缝缀书册的弊病。足见他生活的时代以前，书籍装帧确曾有过线装的形式。然而这只是文献的记载，事实上如何呢？有没有实物流存呢？过去对这个问题做不出有力的回答。现在我们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所藏敦煌遗书中发现了若干种线装书册实物，现举几例，便可从实物的角度进一步、证明这个问题。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5534号，是《金刚般若波罗经》，唐末写本。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类现代三十二开书大小，横用，无上下边栏界行。卷尾有“西川过家真印本”一行，表明此经系从西川过家雕印本的《金刚经》誊录而来。再后是大身、随心、心中心三真言。最后落款为“时

天复五年岁乙丑三月一日写竟信心受持老人八十有三”。按“天复”是唐昭宗李晔所用的年号，本无五年。依次推算，并以乙丑印证，则天复五年已是唐哀帝李柷天祐二年了，这一年为公元九〇五年。再过两年，唐王朝就覆灭了。现在这件东西的右边，缝缀的线绳已经佚去，但当年穿线的一排三孔犹存，证明唐末已出现了线装书。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S 5531号，是《佛说地藏菩萨经》、《佛说续命经》、《摩利支天经》，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有边栏界行。每半叶四行，每行字数不等。首叶背面右半叶、末叶背面左半叶未书字，对折后当做前后封面。其余各叶均双面书字，

折叠后形成四面是字。今存六十四叶，二百五十四文字，加上下封皮，共二百五十六面。这件东西的装帧方式，在右边沿书脊打四孔，用丝线绳在书内骑马式竖穿，在书外书脊处横向索线。很类似现代平精装书的索线方式。这又是一件线装书籍的实物遗存。其卷尾有“庚辰年十二月廿七日”年款一行。按“庚辰”，唐大中十四年（860）、五代后梁贞明六年（920）、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都是庚辰年。据此经纸墨字体风格看，这件东西之抄写装订的年代，脱不出这三个庚辰年。最大的可能是后梁贞明六年（920）这个庚辰。因此，它至少可以做为五代时期就已有线装书的证明。



五代写本《金刚经》线装装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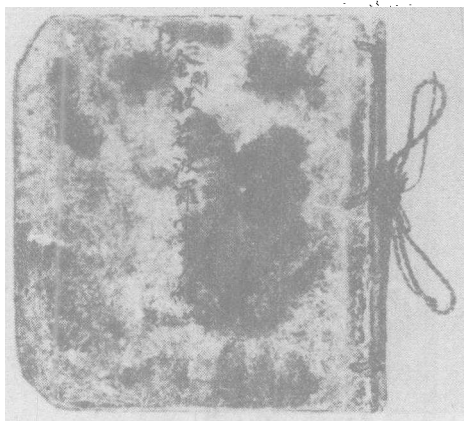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 S 5536 号，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图二)，粗厚麻纸书字，无边栏界行。比现代三十二开书略短。卷前有请八大金刚文。双面书字，对折，另配两张上下封面。其装订方式，在右边沿书脊打两个眼，在眼处横索书脊，且在书的外表竖穿，在下方眼处系蝴蝶扣结死。此件装帧完好无损，装线犹存。此件之抄写年代不明，但观其纸墨风格，似亦是五代作品。故其亦可做为中国早期就有线装书的证明。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 S 5539④号，是《十空讚文》，似为粗厚皮书写，双面书字。每半叶九行，每行字数不等。有上下边栏，有界行。现该件右边沿书脊遗四

孔，线已佚去，证明当时也是用线装订的书籍。这件东西的抄写时代不明，但从纸墨风格看，似亦是五代时期作品。故其亦可作为中国早期就有线装书的证明。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 S 5535 号，亦是《佛说地藏菩萨经》。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有边栏界行，每半叶六行，每行字数不等。开本与今小三十二本相仿。封面是单配的赭红色的麻布。右边有穿线遗孔，表明其当年也是线装书。这件东西亦无明确抄写年代，但似亦不会晚于五代，亦是中国早期就有线装书的明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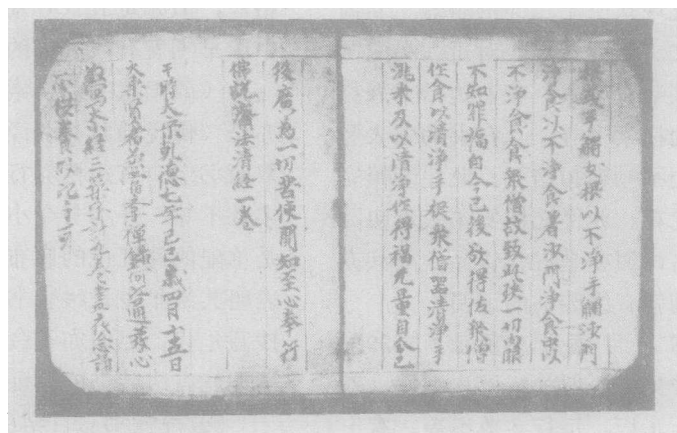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 S 5646 号，亦是《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图三)，北宋初年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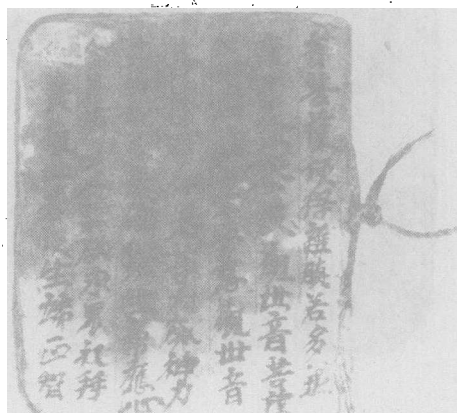
北宋乾德七年(969)写本《金刚经》线装装式

本。卷前有“金刚经启请”，称：“若有人诵持《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须至心念净口业真言，然后请八金刚、四菩萨名号所在之处，常当拥护”。而后是净口业真言。接下是手绘的四菩萨、八金刚像。再下是“发愿文”。再下才是经文正文。卷尾有“于时大宋乾德七年己巳岁四月十五日，大乘贤者兼当学禅录，何江通发心敬写大小经三筑子，计九卷。尽夜念诵，一心供养，故记之耳”题

记四行。全书为粗厚麻纸书写，双面书字。有边栏界行。每半叶六行，每行十二、三字不等。凡五十二叶，一百零四面。书高 15.5cm，宽 14cm。其装帧是在书的右边沿书脊穿三个孔，用两股拧成的丝线绳，横索书脊，并沿书脊竖穿，最后在中间孔处打起蝴蝶结。迄今装帧完好，装订线亦完好犹存。乾德是北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乾德没有七年，实际已是开宝二年(969)，盖为西



北宋乾德七年（969）写本《金刚经》卷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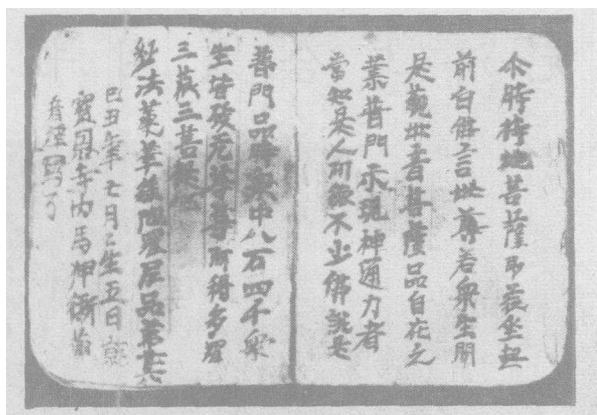


五代写本《妙法莲华经》线装装式

北边陲的写经人不知年号更改所致。这是北宋初年已有线装书的明证。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录 S 5554 号，是《妙法莲华经陀罗尼品》第二十六（图四）。粗麻纸书写，双面书字。有边栏五行。每半叶六、七行不等，每行字数不等，

每书高 14.5cm，宽 11.5cm。凡二十二叶，四十四面。字体粗拙。卷尾有“己丑年七月日生丘日就宝恩寺马神衙观音经写了”落款，表明此经很可能写在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那个己丑。这件东西的装帧，是在书之右边沿书脊居中凿两个孔，然后用两股拧



五代写本《妙法莲华经》卷尾

成的丝线绳，横索书脊，竖穿书背，在两孔中间的书脊上打起蝴蝶结。此件迄今装帧完好，装线犹存。这又是五代时就已有线装书的明证。

由上述文献和实物，均可证明中国线装书并不是起源于明朝中叶，而是起源唐末至北宋初这几十年间。中间经过人们的比较，这种线装方法曾被冷落并淘汰了四、五百年。待到这四、五百年中盛行粘连的蝴蝶装和包背装之后，蝴蝶装和包背装逐渐暴露了自己的缺点，又重新被线装方法所取代，这已是明朝的事了。但明朝的线装，较之唐末五代及北宋初年的线装书，在折叶、订线等方面都不完全相同。可是在用线装订这一点上，则又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等到书籍的生产方式进一步改为铅字排印之后，则线装又逐渐变为平、精装。这又是一种装帧形

式的起源与流变。

前边我们对中国古书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起源与流变，逐一做了探讨。探讨的结果是，无论从文献和实物上，都能证明上述几种装帧形式和方法的起源，全在唐末五代时期，足见唐末五代在中国书籍装帧演变史上，是一个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期，是一个开拓前进、大胆创新的时期。而这种时期书籍装帧演进的特点是不定型、多变化、便携带、得翻阅。旧有的装帧，如卷轴装仍在流行；新的装帧如经折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也都相继出现。有的装帧形式虽然昙花一现，但绝不失为大胆的尝试，并构成某种装帧的起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遗书所提供的研究价值，同样是很高的。